

从咏鸟诗看唐代诗人情感的变迁

徐佳怡^{1*}

(¹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省 延安市 716000)

摘要：唐代咏鸟诗的流变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与诗人情感结构的演进。初唐时期，宫廷咏鸟诗承袭六朝余风，以藻饰为表、功业为里，服务于政治颂美与士人进身之阶；盛唐阶段，李白借“大鹏”“凤鸟”抒发浪漫豪情，杜甫则以“鹰”“朱凤”寄寓仁政理想与现实关怀，体现出理想主义与社会关切的双重书写；中唐咏鸟诗在乱世背景下多抒写身世之悲，韦应物等人延续杜甫传统，以鸟喻世，讥讽现实；至晚唐，咏鸟诗创作臻于繁荣，李商隐以流莺、北禽曲诉党争中之命运，罗隐、皮日休等人则借鹭鸶、鹤媒等冷峻意象批判社会弊端，艺术手法由绮丽转向沉郁，情感基调也从雄健转为哀婉。整体上，唐代咏鸟诗不仅实现了艺术表现与象征内涵的多重突破，也成为观照唐代文人精神世界与情感变迁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唐代；咏鸟诗；情感变迁；意象演变；时代精神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5.619>

The Evolution of Tang Dynasty Poets' Emotions as Reflected in Bird-Praise Poetry

Xu Jiayi^{1*}

(¹ Yan'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bird-themed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era's spirit and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poets. During the early Tang period, court bird poetry carried forward the lingering influence of the Six Dynasties era, adorned with ornate language while concealing political ambitions beneath its surface, serving both as political panegyrics and a stepping stone for scholars seeking advancement. In the high Tang era, Li Bai channeled romantic grandeur through imagery of the “great peng” and “phoenix,” while Du Fu employed the ‘hawk’ and “vermillion phoenix” to convey ideal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real-world concerns, embodying a dual focus on idealism and social engagement. Amidst the turmoil of the Middle Tang, bird poetry often lamented personal misfortune. Poets like Wei Yingwu continued Du Fu's tradition, using birds as metaphors for the world to satirize reality. By the late Tang, bird poetry reached its zenith. Li Shangyin used the wandering oriole and northern birds to lament fate amidst factional strife, while Luo Yin, Pi Rixiu, and others employed images like egrets and cranes to deliver stark critiques of societal ills. Artistic techniques shifted from ornate splendor to somber depth, and emotional tones evolved from vigorous vigor to melancholic lamentation. Overall, Tang dynasty bird poetry achieved multiple breakthroughs in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symbolic depth, becoming a vital medium for examining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emotional evolution of Tang literati.

Keywords: Tang Dynasty; Bird-themed Poetry; Emotional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of Imagery; Spirit of the Times

作者简介：徐佳怡（2000-），女，陕西汉中，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徐佳怡，通讯邮箱：1914456571@qq.com

引言

鸟类意象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吟咏的重要对象，在唐代达到了艺术表现与精神寄托的高峰。唐代咏鸟诗不仅延续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融注新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质。从初唐宫廷应制中的功业隐喻，到盛唐诗人借大鹏、朱凤抒发的豪情与仁怀，再到中晚唐时期以孤雁、病鹤寄托身世之悲与末世之思，咏鸟诗的演变深刻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的转型与文人精神世界的流转。本研究以时间为轴，通过考察不同阶段代表性诗人的咏鸟作品，剖析鸟类意象如何从宫廷装饰逐渐发展为情感载体、政治隐喻与艺术精神的复合符号，从而揭示唐代诗人情感结构的变迁与诗歌内在精神的演进。

1 初唐咏鸟诗：宫廷语境中的形式美追求与功业表达

初唐咏鸟诗的创作与发展，与宫廷文化及其政治语境紧密相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贞观时期，随着国力逐渐强盛与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复兴，唐太宗、魏征、虞世南等人强调文学应服务于政教，批判齐梁文风中的浮艳倾向，提倡“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1]。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宫廷诗仍延续了齐梁以来形式华美、讲究辞藻的传统，咏鸟诗更成为颂圣应制、歌功颂德的重要载体。

唐太宗在文学创作上颇有建树，尽管他的咏鸟诗作并不多，但包括《赋得早雁出云鸣》和《咏鸟代陈师道》在内的几首咏鸟诗，都生动地描绘了他晚年宫廷生活的景象，风格柔美，语言华丽，充分展现了梁、陈诗风的韵味。以《赋得早雁出云鸣》为例：“初秋玉露清，早雁出空鸣。隔云时乱影，因风乍含声”^[2]。诗歌表现出了展现了华美的语言和精巧的对仗，但情感表达略显不足。此外，褚亮、刘孝孙等唐太宗的朝臣，都与南朝和隋代的绮艳诗文群体有着深厚的联系。例如，刘孝孙的《赋得春莺送友人》中：“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待雪销金禁，衔花向玉墀。翅掩飞燕舞，啼恼婕妤悲。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3-1]。语言纤弱，笔力不振，其中的“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是典型的梁陈宫体风格。初唐诗坛，帝王周围聚集的宫廷文人，常赞颂帝业、歌功颂德以彰显帝国声威。在宴享时应制唱和，借诗文助兴点缀盛世，满足帝王的统治需求。

在这一阶段，咏鸟诗不仅服务于政治颂美，也成为士人谋求进身之阶的媒介。例如杨师道的《应诏咏巢鸟》中，“桂树春晖满，巢鸟刷羽仪。朝飞丽城上，夜宿碧林陲。背风藏密叶，向日逐疏枝。仰德还能哺，依仁遂可窥。惊鸣雕辇侧，王吉自相知”^[3-2]。诗人以慈乌反哺象征孝道，结尾四句借用王吉射鸟典故祝寿，以期得到帝王的认可与赞誉。在遵循宫廷礼仪的同时为自身功业的成功铺就道路。虞世南《飞来双白鹤》借双鹤高飞暗喻人生际遇，皆在物象中寄寓颂圣或言志之心。更有如李义府《咏鸟》，以“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4-1]委婉表达求仕之意，太宗亦以“与卿全树，何止一枝”^[3-3]予以嘉许，显示出咏鸟诗在政治交往中的实用功能。

袁行霈曾指出，初唐诗歌存在“从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之趋势^[5]。尽管贞观宫廷咏鸟诗仍以应制与功业诉求为主，其情感表达中的艳情成分已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抱负与仕途理想的抒写。随着帝国气象日盛，士人心态亦趋于开阔，咏鸟诗逐渐突破纯粹的形式美追求，开始承载更丰富的情感与人格内容，为盛唐咏物诗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

2 盛唐咏鸟诗：理想主义与现实关怀的双重书写

盛唐国力愈加强盛，政治开明，国君心态开放，这为文人从事政治活动及实现功业理想提供了强大支撑。咏鸟诗在盛唐诗人钟爱的诗歌类型中虽并非焦点，但由于鸟类作为情感载体具有强烈的鲜活性，加之诗歌整体水平提升，咏鸟诗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尽管许多诗人在盛唐时期的个人境遇不佳，但他们并未与社会脱节，反而展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救世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批评和讽刺。

2.1 讥讽时事

从咏鸟诗的发展史来看，盛唐时期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将社会政治现实融入诗歌，他们通过咏鸟诗来表达对现实和政治的讽刺，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储光曦在《群鸦咏》中写道：“群鸦随天车，夜满新丰树。所思在腐余，不复忧霜露”^[6-1]。诗人以“群鸦”来喻指小人，委婉地讽刺了身边那些追随“天车”的贪禄小人。

南朝已有诗人吟咏百舌，刘孝绰和沈约都有诗、赋流传。但内容大都是借咏鸟来反衬思乡。王维的《听白舌鸟》则有所不同：“上兰门外草萋萋，未央宫中花里栖。亦有相随过御苑，不知若个向金堤。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万户千门应觉晓，建章何必听鸣鸡”^[7-1]。诗前六句着力刻画百舌鸟，先点明其栖息于深宫禁苑，凭借婉转的鸣唱深得帝王青睐，得以在宫阙花丛间栖息，在御苑金堤旁鸣啭。末二句“万户千门应觉晓，建章何必听鸣鸡”则暗讽当时的社会现实：真正能司晨报晓的雄鸡与贤良之士，不被当权者看重，而朝堂所重用的，恰是这类巧舌如簧的百舌鸟之流。全诗虽无一字直斥政治，却通过百舌鸟与鸡境遇的鲜明对比，将隐忧与不平尽皆托出，以写鸟可见诗人愤懑之情。

储光曦与王维都借鸟来喻指讥讽时事，虽未直言但愤懑之情呼之欲出。同时，二者不单是讥讽时事，前者情感色调中含有隐退的倾向，寄怀相对含蓄；后者通过对“巧言”的警惕，在批判政治的同时侧重修心，二者的核心是自我心境的清净与隐退。与强盛的国力相伴的是诗人包容的心态，因此盛唐咏鸟诗仍然以李白和杜甫为代表，前者借咏鸟来表现其豪情壮志与理想追求，后者则在其咏鸟诗中表达了深沉的仁政情怀和时代心声。

2.2 豪情壮志

李白的咏鸟诗体现出了他浪漫主义的诗人本色，他的咏鸟诗以其形象生动、意境高远而著称，在诗作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激昂的情感和对自由飞翔的向往。李白天生喜欢鸟类，尤其钟爱那些自由翱翔、不受束缚的飞禽。他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描述自己与隐士东岩子在崛山上隐居时：“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8-1]。虽不免有夸张之感，但也反映出了李白对鸟多有喜爱。在《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一诗中，李白对白鹇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来形容白鹇的美丽^[9]。在《古风》中，他赞美双白鸥的自在与超脱，在对白鸥超逸不群的赞美之中表达了自己不愿与权贵为伍，渴望隐居江海的志向。《鸣雁行》则表现了他爱鸟护鸟的美好品德：“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一一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霜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10-1]。诗人不只写出了胡雁“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矰缴惊相呼”的困境，也以“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对猎雁者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不仅爱鸟更是护鸟，展现了他对生命博大的同情心。

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为统计对象，发现李白诗文中出现的禽鸟不胜枚举，其中凤鸟与大鹏出现的频率最高。李白天生喜欢鸟类，尤其钟爱那些自由翱翔、不受束缚的飞禽。他曾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描述自己与隐士东岩子在崛山上隐居时：“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8-1]。虽不免有夸张之感，但也反映出了李白对鸟多有喜爱。在《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一诗中，李白对白鹇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来形容白鹇的美丽^[9]。在《古风》中，他赞美双白鸥的自在与超脱，在对白鸥超逸不群的赞美之中表达了自己不愿与权贵为伍，渴望隐居江海的志向。《鸣雁行》则表现了他爱鸟护鸟的美好品德：“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一一衔芦枝，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霜缴惊相呼。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10-1]。诗人不只写出了胡雁“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畏逢矰缴惊相呼”的困境，也以“闻弦虚坠良可吁，君更弹射何为乎”对猎雁者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不仅爱鸟更是护鸟，展现了他对生命博大的同情心。

2.3 仁政情怀

杜甫咏鸟诗体物精微、寄意遥深，体现他“救济人病，补时阙”的现实主义本色。其咏物诗现存103首，咏鸟诗32首，每三首咏物诗中就有一首咏鸟诗，涉及鹊、杜鹃、鹰、鹤等多种鸟类^[8-2]。在《归雁》中，杜甫因见江雁北飞而抒发怀乡之情，“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4-2]充满了悲怆。青年时期在《画鹰》中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羌”表达了他昂扬向上的凌云志向，而安史之乱后的《咏鹰》：“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13-1]则展现了诗人忠肝义胆，渴望清除国贼、挽救危亡，寓意颇深。

杜甫的咏鸟诗不单是描绘鸟儿的形态，更寄托了诗人的情感和对时代的思考，诗中充满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高度契合。在杜甫之前的咏物诗，大都没有突破托物言志、借物寓怀的范围。而杜甫的咏物诗则将思想内容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范围内，并且在诗中表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伟大情怀，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杜甫的咏鹰诗在他的咏鸟诗中尤为引人注目，杜甫集中有咏鹰诗九首，非咏鹰但写了鹰的形象的诗三十六首，另有鹰赋一篇^[8-3]。鹰的形象在杜甫的诗中象征着诗人的理想抱负和人格精神。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鹰的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早期诗作《画鹰》^[14-1]中的鹰是诗人豪迈激昂、意气风发

的象征，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义鹘行》^[14-2]则更多地体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命运的思考。

杜甫的咏鸟诗不仅丰富了咏物诗的题材，更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儒家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改变了前人咏物诗较少反映民生疾苦的状况。他的诗歌中，无论是赞叹、悲悯、痛惜还是怀思，都流露出深厚的情感和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3 中唐咏鸟诗：乱世中的身世之感与社会批判

安史之乱后，盛唐转入了中唐。中唐时期国运日衰、宦官专权、边患四起，诗人的生活环境和心态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鲜有抒写豪情壮志的咏鸟诗。此时期诗人大多壮志难酬，因此其笔下的咏鸟诗寄意遥深、讽时刺世。

3.1 托物自伤

中唐时期的咏鸟诗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他们的青年时期虽在开元盛世度过，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巨变使他们失去了盛唐诗人那种豪迈与浪漫。在他们的咏鸟诗是诗人之间的唱和、赠别以及以鸟自喻、感伤身世。例如钱起《赋得巢燕送客》^[3-4]、耿湋《赋得沙上雁》^[3-5]、司空曙《夜闻回雁》^[3-6]等，常常通过鸟儿的离合、孤寂来抒发自伤之情，诗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在艺术表现上，“大历十才子”对鸟的描写格外用心，延续并深化了盛唐咏物诗“即物达情”的传统。比如钱起《衔鱼翠鸟》^[4-3]以简洁传神的笔法，生动再现翠鸟捕鱼的瞬间，富有画面感和情趣。又如《归雁》^[15]将雁的形象与人的乡思情感融合，通过“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的妙笔，把物象与情感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总体来看，以钱起、李端、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其咏鸟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关注自身遭际，风格多阴郁悲凉。与杜甫咏鸟诗不同，他们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在中唐前期，能够承继杜甫现实主义传统，并对后期咏鸟诗产生重要影响的，则以韦应物最为突出。

3.2 讽世寄怀

韦应物现存的咏物诗共二十八首，其中咏鸟诗就有十三首，数量虽不算多，但咏鸟诗占比极高，作为横跨盛唐和中唐的诗人，他对国家兴衰有切身体会。与盛唐储光曦和王维不同的是，韦应物在讽世寄怀的同时表现了功不见用的感慨。

在中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时，韦应物并未选择对现实避而不见，也没有沉溺于个人悲欢，感慨。而是以咏鸟诗讥讽时弊，表达自己的批判和忧虑。如《杂体五首·其二》：“沉沉匣中镜，为此尘垢蚀。辉光何所如，月在云中黑。南金既雕错，鞶带共辉饰。空存鉴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胆，思照冰玉色。自非磨莹工，日日空叹息。古宅集祆鸟，群号枯树枝。黄昏窥人室，鬼物相与期。居人不安寝，搏击思此时。岂无鹰与鹤，饱肉不肯飞。既乖逐鸟节，空养凌云姿。孤负肉食恩，何异城上鵠。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同声自相应，体质不必齐。谁知贾人铎，能使大乐谐。铿锵发宫徵，和乐变其哀。人神既昭享，凤鸟亦下来。岂非至贱物，一奏升天阶。物情苟有合，莫问玉与泥。碌碌荆山璞，卞和献君门。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献知国宝，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岂存”。他用“祆鸟”象征怪鸟、恶鸟，扰乱人们安宁，而本应驱赶它们的鹰和鹤却“饱肉不肯飞”，反映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不尽忠职守^[7-2]。诗的结尾以激愤之情予以斥责，表现了诗人对时政的关注和不满。《燕衔泥》：“衔泥燕，声喽喽，尾涎涎。秋去何所归，春来复相见。岂不解决绝高飞碧云里，何为地上衔泥滓。衔泥虽贱意有营，杏梁朝日巢欲成。不见百鸟畏人林野宿，翻遭网罗俎其肉，未若衔泥入华屋。燕衔泥，百鸟之智莫与齐”^[6-3]。燕子勤劳，得遂安居，但人世之中勤劳未必有美报。加之中唐国势已衰，诗人表面轻淡，言外有羁旅与功不见用的感慨，及对用人失当与世风冷漠的不满。诗人以燕子筑巢华屋自保，对比“野林”中的鸟类纷纷被捕，讽刺了依傍权贵者的处世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乱世之中百姓无处容身的无奈。

总的来说，中唐时期“大历十才子”的咏鸟诗多抒写内心的苍凉，而韦应物则以现实主义精神，创作了许多有讽刺和批判意义的咏鸟诗。中唐咏鸟诗不仅真实反映了时代剧变中文人的精神转向，也以其深沉的情感内涵与鲜明的现实指向，拓展了咏物诗的艺术深度与思想容量，成为连缀盛唐与晚唐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中唐后期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4 晚唐咏鸟诗：象征主义的兴起与批判精神的深化

晚唐时期是中国咏鸟诗创作极为活跃、作品数量繁盛的阶段。元人方回曾指出：“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16]。此评虽显夸张，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晚唐诗歌题材趋于细腻化的倾向。就咏鸟诗而言，从数量分布上看，鹤、雁、杜鹃、燕、鹭、莺等成为吟咏主体，而如巨龙、大鹏这类象征雄健气魄的意象已近乎绝迹，猛虎、鹰等威猛形象亦寥寥可数。在内容层面，不少晚唐咏鸟诗折射出诗人对政治现实与历史走向的深沉思索，传递出末世文人特有的压抑、愤懑与不平之鸣。情感表达上，所选意象多具悲剧色彩，如失群孤雁、泣血杜鹃等承载哀怨传统的鸟类形象，其悲鸣屡屡回荡于晚唐诗坛，强化了整体诗风的感伤基调。

4.1 幽思婉转

晚唐前期的政局动荡不安、翻覆不定，使身处其中的文人普遍产生朝不保夕的忧虑感，心理层面承受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尽管他们仍心怀朝廷，并未完全放弃理想，但已丧失中唐时期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那种讽喻时弊、锐意批判的现实锋芒。与后期随农民起义而彻底绝望的文人不同，这一阶段的士人仍存有一定希望与抱负，只是这些志向在现实压抑下渐趋内敛，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他们大多不具备实际干预朝政的条件，转而将视线从社会现实转向自我精神的书写。在此背景下，晚唐前期的咏鸟诗创作出现显著变化：以讽喻现实、揭露社会黑暗为主题的咏鸟诗数量明显减少，诗人更多借鸟类意象来抒写个人内心的哀怨、愁绪与彷徨。咏鸟诗的关注点从外在社会关怀逐渐转向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晚唐士人在政治低潮中的精神转向与审美内化。

在晚唐前期的政治乱局与文人处境中，李商隐的咏鸟诗集中体现了该时期士人的精神转向与艺术突围。面对宦官专权、竞争剧烈的恶劣政治生态，他虽有强烈的用世之志，却因处境艰难而难以直言陈情，遂将凝重的心事寄寓于咏物诗之中。这一类诗作因其含蓄深远、托物寓怀的特点，成为李商隐在压抑语境中的一种“隐微书写”，既避祸全身，又抒怀言志。在其《流莺》一诗中，“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暗合诗人宦途漂泊、命运无主的身世之感^[3-7]；“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则隐喻才情不为人识、抱负难逢时机的憾恨；而“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更以昼夜交替、宫门启闭象征朝局之诡谲与党派倾轧；末句“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将流莺无栖与诗人失所之悲融合为一，物我双写，被后人誉为“含思宛转，独绝古今”^[17]。另一首《北禽》作于梓幕时期^[6-4]，诗人以“北禽”自喻，“为恋巴江好，无辞瘴雾蒸”暗指依附幕主以暂得栖身；“纵能朝杜宇，可得值苍鹰”传达即便有意报效仍难逃政敌迫害之忧；“石小虚填海，芦铦未破矰”则透出虽怀精卫之志却无力突破现实困境的悲慨；结尾“知来有乾鹊，何不向雕陵”更流露出渴望预知危机、远害自保的心态。全诗将诗人的政治处境与北禽意象高度融合，展现其在党争夹缝中力求自存却难有作为的压抑心理。

李商隐通过这些作品，成功将个人身世、政治体验与咏鸟传统相融合，形成一种“物我互渗”的抒情范式。其咏鸟诗不再停留于传统的比兴寄托，而是将物象、情感与时代氛围高度整合，极大地拓展了咏物诗的情感深度与艺术表现力，对后世咏物诗创作影响深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商隐成为晚唐前期咏鸟诗最深刻的代表，其创作也标志着唐诗在政治低潮中向内心世界与象征艺术的深刻转型。

4.2 怨世讥时

晚唐后期的咏鸟诗创作，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呈现出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的鲜明特征。随着唐王朝国势日趋衰微，政治腐败、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日益加剧，诗歌创作也在延续中唐新乐府派关注现实传统的同时，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转变。诗人的创作重心从“救济人病”的讽喻意图，逐渐转向更具批判性与抗争意识的社会讽刺，他们常借咏鸟以抒击现实之愤、寄托忧世之思。在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笔下，咏鸟诗成为针砭时弊的利器。

皮日休《喜鹊》以鹊喻人^[6-5]，讽刺趋炎附势之徒；陆龟蒙《鹤媒歌》^[6-6]则借“鹤媒”形象影射官场中陷害同僚的奸佞之辈，其《雁》诗更以“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6-7]暗喻乱世中士人的艰难处境。罗隐出身贫寒而才华横溢，他“自以为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13-2]。进一步将个人不平之气与对朝政的批判融为一体，其《鹭鸶》中“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3-8]直指伪善之弊，

《鹰》中“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3-9]则讥讽朝政积重难返。杜荀鹤虽语言质朴，却在《闻子规》等作品中以“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抒发出寒士不遇的悲慨与时代的绝望^[3-10]。与此同时，郑谷等人则在艺术层面开拓出新的境界。其《鹧鸪》一诗不滞于物态摹写，而致力于营造凄迷意境、传递哀婉情韵，展现出晚唐咏鸟诗在审美层面的深化与创新。

总体来看，晚唐后期的咏鸟诗在整体上凝聚为一种具有批判意识与悲剧美感的诗歌类型。与盛唐和中唐咏鸟诗不同的是，晚唐后期咏鸟诗讽世直白辛辣，用鸟直接映射权贵、小人和贤士遭际，情感激烈，同时有高洁自守的意象。咏鸟诗既承接了咏物诗的传统比兴手法，又融入了晚唐特有的忧患意识与讽喻精神，在感伤中见锋锐，于寄兴中寓批判，成为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收束。

5 结语

唐代咏鸟诗的转变，堪称一部以羽翼载录的时代精神史。从初唐虞世南笔下“映海疑浮雪”的白鹤，到盛唐李白诗中“抟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再到中唐韦应物“岂无鹰与鹯，饱肉不肯飞”的鹰与鹯，最后到晚唐陆龟蒙笔下“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的孤雁，鸟类意象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唐代诗人从昂扬进取到彷徨沉郁的心灵轨迹。这种演变印证了自然物象在我国诗歌中是审美、道德与情感的象征载体。唐代咏鸟诗实现了三重突破：在艺术技法上，诗人突破齐梁咏物窠臼，李商隐“物我双写”的婉曲与郑谷“传神写照”的韵致，拓展了咏物诗的意境深度；在精神品格上，诗作彰显了唐代士人的气节与担当，杜荀鹤以子规啼血喻寒士之悲，罗隐借鹭鸶素白讽伪善之态，皆在困厄中不失批判锋芒；在文化意义上，鸟类意象从宫廷祥瑞到自由精灵，再至乱世悲鸟的演变，成为“文变染乎世情”的生动注脚。唐代咏鸟诗的永恒魅力，不仅在于其精妙的艺术表达，更在于它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磅礴之气与深沉之思。它既是诗人个体才情的飞扬，更是华夏文明“天人合一”哲思在诗歌中的璀璨绽放。

参考文献：

- [1] 清·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 潘永因. 传统文化修养丛书·万首唐人绝句·上[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1.
- [3] 黄勇. 唐诗宋词全集·第1册[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336.
- [4] 周啸天编著. 历代绝句鉴赏大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4: 157.
- [5] 袁行霈. 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J]. 北京大学学报, 1994, (6).
- [6] 周振甫. 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3册[M]. 合肥：黄山书社，1999:971.
- [7] 于志鹏. 宋前咏物诗发展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44.
- [8] 赵梦. 唐代咏鸟诗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 [9] 周梅，杨晓云. 张广亮编. 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诗选[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68.
- [10] 邵丽鸥. 中华古诗文[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3: 10.
- [11]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 李白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98.
- [12] 林东海选注. 李白诗选[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92.
- [13]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3.
- [14] 闵泽平校注. 杜甫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上[M]. 合肥：崇文书局，2023: 11.
- [15] 徐天闵选，熊礼汇校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古今诗选[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54.
- [16]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00.
- [17]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893.